

发现中国

传统与现代

CHINA FÜR ANFÄNGER
Eine faszinierende Welt entdecken

[德] 卜松山 著
(Karl-Heinz Pohl)

张 伟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发现中国

传统与现代

CHINA FÜR ANFÄNGER

Eine faszinierende Welt entdecken

〔德〕卜松山 著
(Karl-Heinz Pohl)

张 伟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德] 卜松山(Pohl, K. H.)著;
张伟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097-7816-6

I. ①发… II. ①卜… ②张… III. ①中国-国情-
研究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7107 号

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

著 者 / [德] 卜松山 (Karl-Heinz Pohl)

译 者 / 张 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安 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816-6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5-477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hina für Anfänger: Eine faszinierende Welt entdecken

Copyright © Verlag Herder GmbH, Freiburg im Breisgau 2008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German language
edition by Karl-Heinz Pohl.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中文版根据 Verlag Herder GmbH 2008 年版本译出。

译者的话

德国知名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教授的这本《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专著，原是为德语区读者撰写的一本中国文化入门级读本，中文读者初读起来可能感觉浅显，但由一位对中国颇有好感的欧洲人士来书写中国，古老的东方智慧如茗茶清香般间或溢出，细细品味别有一番情趣。该书在德文图书市场受到读者异乎寻常的关注，作者收到大量反馈，并一再增订出版。

跨文化对话（interkultureller Dialog）已然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可或缺的主题，亦为卜松山教授的研究重点之一。卜先生浸染汉学、文化、哲学界近四十年，在本书中诠释中国问题的“跨文化视阈”（interkultureller Horizont）独到——身处西方而凝眸东亚，经由传统而剖析当今，出入哲学而品评生活。下列行文将对卜松山先生的“跨文化视阈”进行简单梳理。

“他者”与“换位”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西方人，却为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文名字——“卜松山”，还颇有几分道家意蕴。卜先生身居德国西南边陲古城特里尔，胸中却有一番“天下”丘壑。仅有十

万居民的古城特里尔与中国的渊源始于马克思。几个颇有意思的巧合是：卜松山（Karl-Heinz Pohl）与马克思（Karl Marx）拥有相同的德文名字“卡尔”（Karl）^①，两人出生地也相距不远，且均与当今中国关系密切，不过马克思以“主义”风行于神州，卜先生以“汉学”闻达于业界。

卜先生的“跨文化视阈”，理应是在后现代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横跨西东文化、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而渐次形成，并逐步奠定其作为一代汉学及跨文化学者治学所力求掌握的方法与气度，用法国著名学者于连（François Jullien）的话说就是“换位思考”（Ortswechsel des Denkens）（参见第一章：文化），落实到中国道家先哲庄子那里就是摆脱“井蛙之见”的一种相对性。

站在跨文化“彼岸”，卜先生用相对客观而冷静的笔触来叙述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今世界的一些重要关联，比如中西（主要是德国）媒体上有关“他者形象”（Fremdbild）的构建倾向及其深层根源，在西东文化邂逅中由于民族性格及文化视阈差异所带来的理解或误解等。因此，具备一种“跨文化”的“移情能力”（Einfühlungsvermögen）[富布赖特（J. W. Fulbright）语]不仅成为跨文化学者，也成为跨文化精英努力追寻的方向。

如果以“跨文化视阈”来解读，则中西（主要是中德）双方文化、历史、哲学宗教背景等差异导致了“他者形象”的错位。具体到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部欧洲五百年来跌

① 昌切：《文化间际对话》，载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中华书局，2000，第218页。

宕起伏的中国形象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国形象被再三误读的历史。自马可·波罗的“契丹之国”以降，到中世纪的“礼仪之争”、20世纪初前后的“黄祸”（gelbe Gefahr）以至近年的“黄色间谍”（gelbe Spione）^①，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几乎都是片面或失真的。在跨文化学者卜松山眼里，这是“基于一种肤浅的认知”，归根结底是自基督文明诞生以来逐渐占据上风的“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文化优越感所导致，因此，现在到了结束“欧洲文化独角戏”而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时候。

传统至现代

中国传统价值观对现代中国甚或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既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有其哲学与伦理的内在逻辑。经由卜先生的“跨文化视阈”，中国传统也就穿越时空与现代展开了对话。

在经卜先生提炼的中国“主流传统”（参见第四章：价值体系：“主流传统”）（如阴阳、五行思想、儒道佛）谱系里，尤以儒家与道家传统价值散发出持久魅力。其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及个人的决定性影响自始至终未曾消减（仅在“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干扰），比如“内圣外

^①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明镜周刊》在2007年8月曾以《黄色间谍》为题做封面报道，由于其涉嫌刊载严重辱华言论与图片，引发旅德中国学生学者集体抗议，并被起诉至法院。《明镜周刊》2007年8月26日，《德国之声》2007年11月21日，<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960277,00.html>。

王”的典范作用，“义优先于利”、“社会优先于个人”、“责任重于自由”等价值观，“天人合一”、“和谐社会”理念以及勤劳、节俭、忍耐等儒家派生道德贯穿中国社会文化始终。“无为”、“自然”、“自由”，以及“相对性”、“看淡生死”等道家理念，与儒、禅学说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卜先生视阈下的该传统揭示了两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源源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复与更新、在王朝更替进程中扮演起关键性的文化传承角色，并对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向度与行为塑造产生了持久影响。

儒家价值学说在现代中国及当今世界的“普世性”意义，被卜先生赋予了一种重大的后现代特征：后儒家价值之于后基督价值。以马克斯·韦伯的“目的理性”来看，儒家伦理可媲美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述基督教的积极社会功能。儒家价值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不仅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过去辉煌与中国当代的经济活力得以印证，更一度越过亚洲疆域而对逐渐式微（比如二战后）的西方价值起到“镜鉴”甚至“拯救”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60~70年代的欧洲，主张“入世”的儒家曾一度被主张“出世”的道家所取代，主要是受到经由美国传入欧洲的中国气功、道宗、禅宗的影响。在21世纪，儒家似乎在中国全面“复兴”，孔子甚至有了完全“成圣”^①的可能。

哲学之于生活

德国人与中国人在哲学理性、日常生活及礼仪习俗规则方

^① 《孔子归圣之路》，《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月25日。

面尽管表现迥然不同，却也不乏相通之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西双方均认可的处世“黄金定律”，康德“心中的道德律”与儒家的“修身养性”及“内圣”理念似乎也能找到某种对接点，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中国思维具备走向世界的潜力，并逐渐获得更为广泛的响应。

在日常行为举止方面，卜松山先生通过截取一些情趣盎然的生活片段或场景，对普通中国人礼仪习俗与日常举止行为（如等级、客套、面子、关系文化）（参见第五章：社会与个人，第六章：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跨文化”品评并予以积极理解，当然也不忘提及其消极作用（如好面子与关系文化的负面影响）；在论及《孙子兵法》在现代商战的运用及对中德双方商务谈判技巧策略的描绘方面，有不少惟妙惟肖之处，同时也指出其在跨文化方面的“理解也是误解”^①所在。

毋庸置疑，这本颇有韵味的跨文化读物不仅为德语区读者开启了一扇通向遥远东方古国的大门，也值得万千中文读者将其视作一册中国哲学传统删节本闲来品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书的中文版本，或许能为中国的海外汉学研究者或爱好者拓宽“另一视阈”提供些许借鉴，也或许能为在当今快速转型的社会背景下，普通中文读者对深受影响却疏于察觉的自身传统文化进行梳理与佐证提供一种可能。毕竟传统哲学及宗教文化与每一位现代人的精神指向或多或少有关，也与作为个体的自我“修身”与教育息息相关。

此外，作为一位跨文化“对话”的推手，卜先生对有些

① 卜松山：《译不可译之文》，《世界哲学》2003年第2期。

问题善意地提出忠告，譬如传统的断裂、虚无民族主义危险、道德滑坡与信仰真空、腐败问题、环保问题、贫富差距、人口发展及关系文化的负面作用等，有些忠告是建设性的，因为作为“他者”的欧洲人能“看到我们所不见”，有些我们已经有所认识但尚不深刻，因此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

翻译及其他

辩证地看，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坐而论道”的学者，无论身处“此岸”或“彼岸”，无论自身想多么“超脱”，都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卜先生所说的“区域主义局限”。这或许与学者自身的母语文化背景、跨文化经历及学术研究动因有关。正如东方知识分子难以完全走出“东方中心主义”窠臼一样，西方学者与精英也容易流于“西方中心主义”论调；何况现代“文明病”既滥觞于西方，也蔓延至社会巨变的中国，且不排除解构“他者”是以重构“自我”为目标，因而卜松山先生的“跨文化视阈”也同样会或多或少受到西方“视阈”的影响，有的甚至会因其对中国的过度好感而产生另一种跨文化“误读”。

站在跨文化的角度，其实“翻译本身并不可为”，因为翻译是一个层叠与丢失信息的过程，何况要经历从语言到文字、从德文到中文，部分篇章从古文到今文的多重译介过程，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言，“翻译包括两个层面：跨越时间的翻译与跨越空间的翻译”^①。译者唯有尽量接近原著、

① 卜松山：《译不可译之文》，《世界哲学》2003年第2期。

客观呈现，但仍难免有时会步入庄子所说“得意忘言”的尴尬境地。译文中保留了西方学者原名并截取了部分重要的德文或英文语汇；为与篇章整体行文风格保持一致，译者对德文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使用了通俗译法，同时附注了原始典籍来源^①（用李泽厚的说法是“回到原典”），以便古文爱好者对照阅读。古文今译与校注也同样是一项细致繁琐却极为重要的工作。

在此书翻译过程中，卜松山教授、乔伟教授、梁镛教授、刘慧儒博士、Benedict Marko 与 Daniel Kuenstler 先生等学者给予了我不同程度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刘秋平女士对翻译工作贡献良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案头资料未尽详实，加上时间较为仓促、翻译经验不足，本书翻译难免有所疏漏，望请读者谅解。

张 伟

初稿写于 2010 年 2 月 8 日，德国特里尔

修改于 2015 年 10 月，武汉

① 古代典籍的原典和译注参考了下列专著：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栗劲主编《白话四书五经》，长春出版社，1992。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书社，1987。王世舜主编《庄子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汪榕培、任秀桦、秦旭卿、孙雍长：《庄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论语》（*The Analect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周易》，中华书局，2006。《论语 金刚经 道德经》，中华书局，2009。《庄子》，中华书局，2007。《孟子》，中华书局，2006。《孙子兵法·孙臆兵法》，中华书局，2006。

中文版序

当初撰写这本书时，未曾想到要将这一德文版本翻译给中文读者，它只是纯粹面向那些对中国传统感兴趣的德语目标读者所写的入门级概况，因为不无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包括文学与哲学）在德国一直不曾为人所知。尽管中国是 2009 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览会的主宾国，但其结果令人失望，公众对主宾国的认知并未因此改观，相反却继续表现出愚昧无知、误解且缺乏沟通。即使只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也值得我为德国公众撰写此类图书。

迄今为止，这本书在德国已经出版了五次。特别是最近三次的增订出版，不仅在每次出版时多有适时更新，而且其内容也备受读者关注。此书的德文写作大约始于十数年前，起初是为德国商务人士与关注中国的人所撰写的一本中国简略指南，以此介绍一些在西方仍普遍感到陌生的中国文化。当时版本的主体部分是关于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与行为方式，但为帮助读者理解相关文化术语，也做了些简短的导入式解释；同时用较短篇幅来介绍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一些篇幅论及历史（主要是自 1840 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现代政治状况，在最后还是概略阐述了中国哲学史（阴阳思想、儒道佛）。自第三次修

订出版以来，该书内容重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先版本中的哲学简史部分在新版本中得到极大扩充，并成为该书最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此书不再是一本首先面向商界人士的指南（尽管我也总是从这些人士那里得到颇为正面的反馈，这给我以极大鼓励），而是一本描述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史书籍，并因此引发思考：其悠久的历史印记在当今世界怎样得以体现？在何处得以体现？此外，新增的重点部分也反映了我的研究兴趣所在（即内容广博且令人神往的中国哲学史）。因此，现今该书的德文版本还有一个副标题——“发现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

拙作即将用中文出版，作为作者的我当然很高兴，但也颇感不安，因为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也许显得非常浅显，也许对中国的描写显得较为片面。如果说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也最多是对中国做了一种全景式的描述；甚至，其会使中国读者感觉新鲜有趣，换句话说，看西方的高鼻子民族如何理解中国。另外，写这本书的初衷，不仅是出于本人近四十年来从事中国研究的这一学术经历，而且也是由于多次赴中国考察以及与中国朋友无数次会晤交流所致。就此而言，尽管这本即将在中国出版的书中可能会出现谬误、短视与片面，但也许仍存在我可用来请求谅解的唯一理由：出于对中国的盎然兴趣与诸多好感而写就。

在此尤其要感谢本书译者张伟先生，他为此付出了极大心血，将我难懂拗口的德语翻译成文笔优美的中文。

卜松山（Karl-Heinz Pohl）

2009年2月

于马克思故乡特里尔

第三次增订版序

要描述中国，2008 年似乎是一个艰难的年份。鉴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世界性影响，人们早已期待，伴随这一体育盛事到来的将是政治利益的加速实现。然而，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事实并不尽如人意。那些中国事务专家们首先在“台湾问题”上坐立不安：中国台湾地区在 2008 年 3 月举行了地区领导人选举，寻求台湾独立的势力并未在这场选举中得逞，而是原则上不排斥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国民党候选人获胜。他（马英九——译者注）的当选拆除了一颗潜在的政治炸弹。在台湾“大选”之前，西藏爆发了骚乱，在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了国际抗议事件，这些都给中国形象造成了巨大伤害。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又一次急速地黯淡下来——一如 1989 年之后。

仅仅数周之后，发生在四川的一场毁灭性地震夺走了大约 8 万中国人的生命，在这场巨大的天灾面前，中国人非比寻常地展示了其光辉动人的一面：突如其来的救助精神与史无前例的团结一心，媒体与政治前所未有的开放迅速颠覆了一个封闭、集权国家的固有形象。观察家因此大跌眼镜：有关中国的公众舆论为何变化得如此之快？

由于在奥运会背景下发生的“西藏问题”对我们感知中国具有长远意义，在此应对其作一番简短追述——尽管这一棘手的问题不可能在一个前言里充分展开论述。另外，有关西藏骚乱及奥运会火炬示威游行的内幕最近才予以曝光，以致我们对此事的评判将可能出于历史原因而与现今的媒体报道有所出入。简单地说，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有诸多不同视角，其中似乎尤以西方好莱坞式的浪漫占据主流。与此相反，中国人一致认为（其中包括台湾人亦如此），西藏千百年来都属于中国，并且是他们把西藏人民从一个宗教农奴制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尽管西藏在一段时间里也深受其害，但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相比并不算最糟。总体上看，这一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藏人民也过上了“小康生活”。但在西藏人自己看来似乎理所当然的是另外一种观点，当地人权状况也并不十分明朗。虽然西藏曾受到在印度进行殖民活动的英国人武力威胁而被迫打开大门，并在1912年于中华民国建立之际单方面宣布过“独立”，但其所谓“独立”并未得到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承认。

尽管如此，中国政治高层与奥运会火炬游行示威者的生硬过招以及对达赖喇嘛的罪状指责（尽管在我们看来，这一指责是情有可原的）并未使中国在西方赢得普遍同情。相反，这些事件更印证了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形象的认知。因为西方民众至今都在以不同的标准来标榜人权，并推崇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最高精神领袖，而且无视中国在实行了30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政策后向世界展示其最美好方面的意愿——这在西方被批判为十足的宣传，并被拿来与1936年的纳粹奥运会相比。

在中国，有关奥运会以及与此相关的西藏抗议的视角却截

然相反。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91年（应为1993年——译者注）否决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首次尝试之后（1989事件在当时仍记忆犹新），这一次——无论宣传与否——整个中华民族都沸腾了，他们怀着自豪、带着喜悦翘首以盼奥运会的来临。西方有关抗议与呼吁抵制奥运会的媒体报道被多数中国人视作企图在中国重温殖民旧梦——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中国施加了长达百年的殖民凌辱。在政治及道义上，大多数西方民众自负地怀疑（或者说不理解）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国家现代化。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人眼中的自我形象就此割裂开来。

人们不应忘记，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从未有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将如此众多的民众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甚至在政治，尤其是在法律上的境况都与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会能为国家开放做出又一重大贡献，更不用说“绿色奥运”将带来的成就——北京生态环境的改善对这个国家的典范意义。然而，西方人却一心想让这场被中国人寄予厚望的狂欢盛宴散场，并极力羁绊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国人的这些担忧正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与西方帝国主义紧密相联的恐惧感。

与此相对的是在西方世界（德国恰好也在其中）蔓延开来的恐惧感：所谓新“黄祸”——经济地位的威胁、“中国崛起即是我们的衰退”、“亿万相似的面孔”、“自始至终的微笑者”、“步调一致”的民众。这些都是潜意识的恐惧，并以此确立中国形象及西方形象。就这点来说，我们期许问题丛生的2008年能带来些许改变，譬如通过相互倾听对方的观点以减少这种恐惧。然而，从长远来看，西方媒体似乎宁可将中国视

作一个新兴的对手，我们的政治家们深谙，站在达赖喇嘛一边首先能在内政上（也在媒体上）得分。相反在中国，由于西方过于袒护西藏，人们开始回忆起中国被殖民者瓜分所受奇耻大辱的时刻，并由此开始疏远西方。

吊诡的是，西方指责中国越厉害，成效似乎越不大——不仅对西藏如此，对容易接受西方事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同样也如此。时至今日，欧美一度成功运行的政治经济模式即使是在持不同政见者那里都已失去魅力，何况时值中国民族主义明显抬头之际。当西方国家不那么处心积虑地通过对政治与媒体的施压而去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时，反倒明显赢得中国人的好感。这正印证了道家有关事物发展规律的观点：物极必反——越企图掌控事物的进程，越可能事与愿违。因此，道家告诫人们，无为——不作为、不过分施压。然而，这样的人生智慧与我们的记者及政治家们（包括西方与东方）的处世原则似乎并不合拍。让我们真切希望，2008年的夏天在政治上不至于太过火，奥运会后的各方关系会再次走向正常化，也就是说，希望中国朝着建设一个法制国家的方向继续前行，甚至有可能在缓和来自国外的压力以及顾全各方颜面的情况下，赋予西藏更多的文化自主权。

本书在第三次出版之际已做全面修订。最重要的改动涉及文化、中国形象及德国形象部分，有关最近的史实及事件也得以补充说明。

2008年5月

于德国特里尔